



中日网

---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当前位置: 首页 > 研究专题 > 汪精卫政权 > 论文

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年会暨江桥抗战学术研讨会综述

发布时间: 2010-02-01 点击次数: 547 作者: 吴丽华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09)06-0195-02

为了纪念江桥抗战78周年,深化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由齐齐哈尔大学、江桥抗战研究会、黑河市人民政府、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年会暨江桥抗战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7月25日—28日先后在齐齐哈尔市和黑河市举行。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天津、北京、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台湾、福建等13个省、市、自治区专家学者140余人参加了会议。

在齐齐哈尔市举行的会议开幕式上,齐齐哈尔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铁静、齐齐哈尔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凤琴、江桥抗战研究会会长伊忠义、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秘书长徐启新、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顾问关捷教授分别致辞,一致强调深入研究中日关系史和江桥抗战的必要性、现实价值及深远的历史意义。在黑河市举行的会议闭幕式上,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会长付百臣致闭幕词,顾问刘恩格教授作了学术研讨情况的总结报告。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位于今齐齐哈尔市泰来县江桥镇的江桥抗战遗址、江桥抗战纪念公园、江桥抗战纪念馆。在前往黑河途中,与会代表考察了日本关东军所筑重要军事要塞之一——孙吴胜山要塞。在黑河市,参观了华人旅居俄国事迹展览馆和爱辉历史陈列馆。

本次研讨会集中了全国特别是东北三省研究江桥抗战及东北地区抗日战争、近现代东北亚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学者。其中有:中日关系史研究专家著名学者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日文系陈鹏仁教授,台湾东海大学林藤鹂教授,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徐启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林晓光研究员,中央党校刘建飞教授,甲午战争史研究专家、原大连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成员关捷教授,威海市中国甲午战争纪念馆原馆长威俊杰研究员,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刘恩格教授,抗日战争史研究专家、中国近代史所曾景忠研究员,中国海军史研究专家原海军军事科学院政委张序三中将,烟台海军航空学院苏小东教授等。

此次研讨会议题广泛,研究内容全面深入,成果丰富。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64篇,其中包括中日军事关系史研究文章23篇,中日政治关系史研究文章18篇,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文章17篇,人物研究4篇,其它2篇。许多新问题、新看法及新的研究角度的提出,令与会学者深受启发,拓展了进一步思考的广阔空间。

纵观与会学者提交文章的全部内容和研讨的结果,本次学术研讨的主要成就有以下三点:

第一,以新的视野,从多个角度对中日关系史的各个领域中的诸多新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有所突破。

本次会议注重了从近现代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大背景着手研究中日关系。诸如在《中日关系史美国因素(1844—1949)》一文中,刘建飞对1949年之前的中日美三边关系做一个系统疏理和分析。指出:从19世纪中叶,中国与日本的国门先后被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打开时起,中美日三国之间便形成了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三角关系。日本不仅“脱亚入欧”,加入列强的行列,将中国作为掠夺的对象,而且其对中国的威胁和所造成的危害远胜于欧美列强。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有时充当日本的帮凶,有时又是日本的竞争者,对日本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美国都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换取同日本的妥协。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的侵华战争已经损害了美国的重大利益时,美国才真正选择与日本对抗。在这一百年间,面对日本的攻势,中国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不过,中国在外交上,利用美日矛盾,维护自己利益,也有一定的作为。

许平,苏小东在《从“庙街事件”看20世纪20年代远东局势》一文中认为,到了20世纪初,全球的政治区域缩小,远东开始成为国际对抗和冲突的中心之一。日本、俄国和美国三个太平洋强国在这里角逐,中国处于被欺辱的地位。社会主义苏俄的出现,为这一地区的局势涂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使之更加错综复杂。1920年3月到6月发生的“庙街事件”及所引发的中日、日苏、美日关系的摩擦,就说明了远东这一基本局势,并预示了远东地区更大、更激烈的争夺。关捷在《东北亚的几个问题——以中日韩三国关系为中心》一文中,以当下的东北亚中、日、韩三国错综复杂的关系为研究重点,阐释了中、日、韩三国关系的现状,并指出了维持三国和平关系的关键所在。本次会议还侧重以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多角度研究中日关系。例如林晓光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以抗战期间野坂参三与毛泽东、蒋介石的通信为视点》一文中,利用近些年来发掘的关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宝贵的文献资料,探寻了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领导人关于战后日本的一些基本构想和政策轨迹。邢丽雅在《论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中的思想宣传战》一文中则考察了在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本军方和政府严格控制各家报纸、文学艺术作品和教科书宣传媒体配合军事作战开展思想宣传战以期达到蛊惑人心、煽动战争狂热的目的概况。

高晓燕在《被历史遗忘的特殊群体——日本“残留妇女”调查记》一文中,以黑龙江省域内的日本“残留妇女”为调查对象,从特殊的角度揭露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文中指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期间,鼓励大量日本女孩移民到中国东北与开拓民结婚。1945年8月日本战败,关东军慌忙撤退,致使大量开拓团的妇女滞留在中国,成为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特殊群体。这些残留妇女是在日本“国策”引导下,响应政府号召来到中国东北的,经历了“理想”幻灭的痛苦与迷惘,最终成为自己祖国的弃民。她们是那场战争的牺牲品。王希亮在《麻生献“真?”与“田母神论文事件”评析》一文中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和右倾化的趋势,催动了日本民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思潮的上升,麻生献“真?”和田母神论文事件正是这一思潮的表像。针对此种情况,笔者认为,问题面前,应该理智地思考,策略地应对,最大限度地戳穿日本右翼的谎言和骗术,进一步加强中日之间各个层面的交流,通过各条渠道、利用多种方式深入了解对方,认识包括右翼在内的日本社会,以真诚和友谊消除曲解、误解以及隔阂等负面因素,争取更多的日本民众,使中日两国民间的互信指数会有一个上升的改观。

战俘问题是本次会议研究的新课题。例如曾景忠的《中国战俘收容所如何对待日俘》,郭洪茂的《二战时期日本的盟军战俘集中营研究》,李倩的《日本对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谋略与利用》,王铁军《二战时期日军对华战俘政策概要》等颇有见地的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国和日本对待战俘的不同政策。曾文认为抗战期间,中

国政府对日俘采取了人道主义管理政策。为了减轻日俘的敌对情绪,日俘收容所的名称为“大同学园”、“和平村”、“苏生学园”和“博爱村”。战俘收容所教日俘中国话,教育他们反对侵略战争,争取中日和平友好。与此相反侵华日军却对关押在集中营的中国军民,实行虐待、残杀,用作劳工和细菌战的试验品,与中国的战俘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

郭洪茂系统的论述了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俘虏管理体制及俘虏政策,指出日本对盟军战俘的监管比对中国战俘宽松得多,盟军战俘的劳役和生活条件要比中国战俘好一些。并以日、德两国战俘的死亡率的多少说明日本对中国战俘的暴虐。

第二,以实事求是精神,对中日关系史中的老问题进行了再研究,使之更加科学化和完善化。这在甲午战争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例如戚俊杰的《论甲午战前日本的战争准备研究》、程舒伟的《关于中日战争开端问题的几点认识》、魏国忠的《论我国抗日战争始于黑龙江省的江桥抗战》、孙文正的《江桥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周彦的《江桥抗战体现了中国军民坚强爱国信念》、安成日的《试论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文章大都以确凿的史实为依据,有理有据地论述了中国抗战是14年而不是8年,并认为14年抗战始于齐齐哈尔的江桥抗战。其中对江桥抗战是抗日战争真正开端进行更为科学,更加完善阐述的文章当属魏国忠的《论我国抗日战争始于黑龙江省的江桥抗战》一文。该文从多角度具体论证了抗战14年而不是抗战8年或8年半;抗日战争始于江桥抗战,因为这是一场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的反对日本侵略的较大规模的战争,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反对日本武装侵略的第一个重要战役,得到了全民族的拥护和支持,是政府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它最终为国民政府所承认,马占山因此而受到了执政党的表彰。

在充分肯定江桥抗战意义和作用的同时,对马占山的评价也愈益趋于公正、公允、全面和真实。刘锐的《真正的中国军人—瑞士特派记者奥古斯特·林特眼中的马占山》,于波的《马占山在抗击日军战争中的历史贡献》等文章所揭示的马占山坚持抗击日军的壮举不仅表现在江桥抗战中,而且表现在西安事变期间积极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后,任东北挺进军司令时,奔赴西北疆场,与日本侵略军抗战8年,为保卫西北大后方和保卫延安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与会专家和学者提出了以下三个重要课题,期盼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得到解决并达成共识。

一是14年抗战应否划分为6年局部抗战和8年全面抗战?当前流行的说法把14年抗战划分为6年局部抗战和8年全面抗战。理由是日本在“七、七”事变前所进行的局部战争,中国也是局部抗战,根据是中国的抗战不是中央政府行为。对此,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如此划分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日本侵华的最终目的是灭亡中国。“九一八”事变得逞后不久,便改向热河,并向华北进犯,乃至发动了卢沟桥事变;面对日本的全面侵华,中国人民进行了全面的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因此,江桥抗战不是局部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马占山部队是中国的部队,黑龙江省抗战行为不仅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响应,而且也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和认同。其后的上海抗战,尤其长城抗战更是如此。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应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二是,近百年来日本人为什么疯狂地侵略中国和残暴地仇杀中国人民?甚至直到今天仍有这个迹象?陈明福在《日军多次残杀中国人之根源》一文中以冷静的头脑、平和的心态、理性的思维、辩证的观点,对这一问题作个客观、全面、公正、合理的分析。他从日本文明程度、武士道的残忍、宗教、生死观、道德观、性格、民族观、日本人的天性、历史观等多角度分析了日本人残杀中国人的原因。但其根本原因是决定于日本军国主义掠夺性,抑或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还是日本人由于诸多因素而形成的特殊的心理状态?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是应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中日关系未来的走向,以及中国应当采取的正确对策。与会代表们一致认为,此次会议把学术的理论研讨与学术的实地考察紧密结合使他们取得了学术理论和感性知识的双丰收。例如江桥抗战是否中国抗战的真正开端?迄今尚有争议,即便是持其为真正开端的许多人也包括与会学者中的大部分人也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这方面的感性知识。通过实地考察,从说明江桥抗战全过程的原始图片、实物和资料中,学者们生动而形象地认识到江桥抗战确是“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军队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和布署的反对日本武装侵略的第一个大规模的重要战役,是抗战的真正开端。

作者简介: 吴丽华(1970-),女,齐齐哈尔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

(来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1月 编辑:李光文)